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6 No.3)

在贫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劳动福利制度对扶贫是否具备较好的性价比

林库·穆尔盖伊 (Rinku Murgai)、马丁·拉维里昂 (Martin Ravallion)、

多米尼克·冯·德·沃勒尔 (Dominique Van de Walle)

何谓总体经济的外援收益率

查宁·阿恩特 (Channing Arndt)、萨姆·琼斯 (Sam Jones)、芬恩·塔普 (Finn Tarp)

利用劳动力调查估计季度贫困率：初步结果

穆罕默德·杜依蒂奇 (Mohamed Doudich)、阿卜杜勒乔伊德·埃兹拉利 (Abdeljaouad Ezrari)、

罗伊·范·德·韦德 (Roy Van der Weide)、保罗·维尔麦 (Paolo Verme)

弥补性别差距：

识别加纳、卢旺达、坦桑尼亚和刚果共和国中阻碍自雇女性的因素

艾米丽·尼克斯 (Emily Nix)、艾莉萨·伽姆博尼 (Elisa Gamberoni)、雷切·黑斯 (Rachel Heath)

中低收入国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探讨

保尔·科利尔 (Paul Collier)、玛蒂娜·吉尔伯格 (Martina Kirchberger)、

曼斯·索德尔博姆 (Måns Söderbom)

延长义务教育是否有助于不同性别和农村/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平等

姆拉特·G.吉尔达 (Murat G. Kirdar)、梅尔滕·代伊古鲁 (Meltem Dayioğlu)、

伊斯梅特·科克 (İsmet Koç)

学而升级还是不学亦可升级：对学生入学和退学的影响

伊丽莎白·M.金 (Elizabeth M. King)、皮特·F.奥拉兹姆 (Peter F. Orazem)、

伊丽莎白·M.帕特诺 (Elizabeth M. Paterno)



 世界银行主办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埃里克·埃德蒙兹 (Eric Edmonds)

尼娜·帕维克里克 (Nina Pavcnik)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2016. No. 3 / (美) 埃里克·埃德蒙兹 (Eric Edmonds), (美) 尼娜·帕维克里克 (Nina Pavcnik) 主编; 徐广彤等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201-0491-3

I. ①世… II. ①埃… ②尼… ③徐…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6703 号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 (2016 No. 3)

主 办 / 世界银行

主 编 / [美] 埃里克·埃德蒙兹 (Eric Edmonds)

[美] 尼娜·帕维克里克 (Nina Pavcnik)

译 者 / 徐广彤 肖皓元 朱旭敏

译 审 / 尹志超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许春山

责任编辑 / 王珊珊

特邀编辑 / 孙 競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教育分社 (010) 59367278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491-3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在贫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劳动福利制度对扶贫是否具备较好的性价比	
.....	林库·穆尔盖伊 (Rinku Murgai)
	马丁·拉维里昂 (Martin Ravallion)
	多米尼克·冯·德·沃勒尔 (Dominique Van de Walle) / 1
何谓总体经济的外援收益率	
.....	查宁·阿恩特 (Channing Arndt)
	萨姆·琼斯 (Sam Jones)
	芬恩·塔普 (Finn Tarp) / 43
利用劳动力调查估计季度贫困率：初步结果	
.....	穆罕默德·杜依蒂奇 (Mohamed Doudich)
	阿卜杜勒乔伊德·埃兹拉利 (Abdeljaouad Ezzrari)
	罗伊·范·德·韦德 (Roy Van der Weide)
	保罗·维尔麦 (Paolo Verme) / 77

弥补性别差距：识别加纳、卢旺达、坦桑尼亚和刚果
共和国中阻碍自雇女性的因素

..... 艾米丽·尼克斯 (Emily Nix)

艾莉萨·伽姆博尼 (Elisa Gamberoni)

雷切·黑斯 (Rachel Heath) / 110

中低收入国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探讨

..... 保尔·科利尔 (Paul Collier)

玛蒂娜·吉尔伯格 (Martina Kirchberger)

曼斯·索德尔博姆 (Måns Söderbom) / 134

延长义务教育是否有助于不同性别和农村/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平等

..... 姆拉特·G. 吉尔达 (Murat G. Kirdar)

梅尔滕·代伊古鲁 (Meltem Dayioğlu)

伊斯梅特·科克 (İsmet Koç) / 170

学而升级还是不学亦可升级：对学生入学和退学的影响

..... 伊丽莎白·M. 金 (Elizabeth M. King)

皮特·F. 奥拉兹姆 (Peter F. Orazem)

伊丽莎白·M. 帕特诺 (Elizabeth M. Paterno) / 207

在贫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劳动福利制度对扶贫是否具备较好的性价比

林库·穆尔盖伊 (Rinku Murgai)

马丁·拉维里昂 (Martin Ravallion)

多米尼克·冯·德·沃勒尔 (Dominique Van de Walle)*

劳动福利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实现对穷人自我定位的颇具吸引力的转移支付方式。然而，这样的激励性论据事实上能否充分使效果不佳的劳动福利制度比非目标现金转移支付更受青睐呢？本文在某个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印度穷邦中，借助一项基于调查的非参数性的方法，估计了一个大规模的劳动福利制度计划的性价比。之前的收益是明显的，但缺乏市场工资数据。就同样的预算而言，相比于基本收入计划或与政府定量供应卡

* 林库·穆尔盖伊 (Rinku Murgai) 的电子信箱是 rmurgai@worldbank.org。多米尼克·冯·德·沃勒尔 (Dominique Van de Walle) 的电子信箱是 dvandewalle@worldbank.org。他们都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拉维里昂 (通讯作者) 在乔治敦大学担任首届爱德蒙德·D. 维兰尼 (Edmond D. Villani) 经济学教授，以及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他的电子信箱是 mrl1185@georgetown.edu。本文借助了普甲·杜塔 (Puja Dutta) 和林库·穆尔盖伊所开展的世界银行项目中搜集的数据和开展的分析。笔者感谢西班牙冲击评估基金为本文提供资金帮助。笔者还对 Sunai 咨询私人有限公司以及 Gfk Mode 公司所提供的实地调查帮助表示感谢；对比哈尔邦政府农业发展部的帮助表示感激，他们为比哈尔境内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正在进行的各种倡议提供了真知灼见。阿里卡·拉格朗日 (Alik Lagarange) 和玛利亚·米妮·乔斯 (Maria Mini Jos) 提供了十分有效的研究帮助。此外，我们还收到了来自相关编辑和三名匿名阅稿人、印度统计协会研讨会、巴黎经济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乔治敦大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以及世界银行等的有帮助的评论。这些都是笔者的看法与观点，并不反映其雇主（包括世界银行或者其成员国）的意见。

配给相关联的转移支付制度，非生产性的劳动福利制度对贫穷的影响要小一些。劳动福利制度的生产效率对于将其作为一项扶贫政策的正当理由是十分关键的。JEL 代码：I32，I38。

劳动福利制度计划对其受益者设置了一定程度的工作要求。这样做的政策依据几乎很少建立在该项工作的产出价值上。然而，当信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约束导致无法实现最优收入所得税或转移支付时，他们认为劳动福利制度解决了目标定位的问题。通过只吸引那些有真正需求的人，并鼓励他们在无需帮助时回归正常工作岗位，劳动福利的激励措施解决了分辨谁是真正“贫穷”而谁不是的问题（Besley and Coate, 1992）。

前现代欧洲的福利接受者通常被封闭在“劳动救济所”中，在那里，他们的“不良表现”可以得到控制，这或许是使用劳动福利制度这种“自我目标定位”特点最为著名的例子。从最开始的时候，相关的看法是，仅有最穷的人才愿意被如此封闭。因此，劳动救济所也被视为扶贫中性价比最高的手段（Thane, 2000, 115）。1834 年，著名的英格兰《贫穷法》改革，使用了劳动救济所来确保更好的目标定位，并且这也被视为扶贫资金从 1830 年前后占国家收入的 2.5% 下降到 1840 年的 1% 的主要原因（Lindert, 2013）。

然而，低效率的劳动福利制度是不是减轻消费贫穷的一个性价比高的方法呢？有证据表明，劳动福利制度的确是自我目标定位的。例如，在本文研究的印度劳动福利制度计划中，平均参与率由最为贫穷、缺少财富的人口百分比的 35%，平稳下降到最为富裕的人口百分比的近乎 0（Dutta et al., 2014）。没有任何针对穷人的直接努力，贫穷的家庭倾向于参加（劳动福利制度计划）。然而，如果劳动福利制度参与者的净收益较小，那么即便是极好的目标定位也无济于事。如果劳动福利制度计划在一个充满竞争、充分就业的经济体中给出一个市场工资率，那么就会出现上述情况。然而，如果出现高失业率，比如经济萧条，在饥荒或者青黄不接的地区或时期，劳动福利制度就会得到推崇。推崇者通常会认为（直接或间接）如果没有劳动福利制度计划，工人就会无所事事，并认为净收益就是劳动福

在贫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劳动福利制度对扶贫是否具备较好的性价比

利制度的薪资。

这样的假定可信吗？著名的刘易斯经济发展模型（1954）假定，在损失很少或不损失农业产出的情况下，劳动力能够从农民耕作业进入现代产业部门。然而，正如罗森兹维格（Rosenzweig, 1989）指出的，这就需要农村农场工人的边际产量为零，家庭农场少一个工人，其他家庭成员通过更加努力地工作来弥补这样的差距。人们可能会质疑这两种条件的合理性。更为普遍的是，还有一种私人农村劳动力市场，在参与劳动福利制度的任何阶段，都存在着寻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我们依然对劳动福利制度参与者放弃的收入情况知之甚少。

即便从整体而言，失业率高居不下，放弃的收入也是不能被忽视的。对于更为贫穷的人而言，当参与的私人机会成本较低时，自我目标定位就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但对于所有的人而言，这一成本不大可能都为零。这些隐藏成本的重要性很明显地与政策选择有关。在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中，世界银行（1986）指出，鉴于劳动力的私人机会成本，劳动福利制度计划对扶贫的性价比较低。但是，这份报告没有提出相关证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放弃的收入分布也会对贫困产生影响。

然而，即使不存在放弃的收入，劳动福利制度计划也产生了那些不可能被忽视的、在替代性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中不可能产生的其他成本。为了组织并监管工作场所，劳动福利制度需要相对熟练劳动力的支出，还需要补充的材料投入支出。我们将这些称为“非工资成本”。即便是在南亚非熟练劳动高度密集型的计划中，这些额外的费用也占到了公共支出的1/3。

我们对印度比哈尔邦的一项大型劳动福利制度进行了研究。这是印度最贫穷的邦之一（通过某些指标来衡量，是最贫穷的），2009~2010年，在9000万农村人口中，有55%的人生活在官方确定的贫困线之下。^①同时，农村地区的失业率为18%（其中男性为16%，女性为32%），是国家

① 基于2009~2010年官方规划委员会设定的贫困线。在印度，该邦长久以来扶贫工作效率最为低下（Datt and Ravallion, 2002）。

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劳工与就业部，2010）。未充分就业率（工人的正常状态是被雇佣的，但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似乎要更高一些。

这是一种贫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类型，在这里，劳动福利制度被认为能够战胜并消除贫困。以此为目标，印度 2005 年构建了一项大规模的国家级劳动福利制度计划，承诺每年为任何希望工作的农村家庭提供 100 天的非技能手工工作时间。

本文探寻的是，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纯劳动福利制度方面是否能够充分扶贫，以便证明其是一项向穷人转移资金的有效方法。该计划是否能在信息约束十分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即便是在工作并不产生任何价值的情况下，仍然使得借助工作要求的自我定位机制的平衡向有利于劳动福利制度的方向倾斜？在这个贫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潜在放弃的收入和非工资成本是否过高？

其中一个方法论挑战就是估计放弃的收入。我们基于一个反事实问题的调查回答进行估计——特别是要求受访人预测如果没有这项计划，那么他们能够获得什么。对于其他方式（将在稍后进行论述），这种方式存在诸多优势，并且我们还发现，当与同时聘用的临时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相比时，这种方式给出了可信的结果。然而，当个体受访者没有考虑到随时间推移的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替换可能性时，我们认识到基于调查的方法可能会导致我们高估放弃的收入。这些会在总体上重复计算放弃的机会（比如，在没有劳动福利制度计划的情况下，个体工人可能会知道存在另外一个可获得的工作，但其他的工人可能会在他们的回答中想到相同的一份工作）。我们甚至使用自己的方法对大幅高估放弃收入的可能性进行敏感程度测试。

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另外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反事实分析。在理想状态下，人们能够通过将财政资金用于大规模的劳动福利制度项目中从而降低贫困，这并不会让人意外（很大程度上通过对非穷人的征税来获得资金）。更为有趣的问题是，如果对同样的公共资源进行可行的替代性分配，是否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在贫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劳动福利制度对扶贫是否具备较好的性价比

一个明显的反事实情况就是基本收入计划（BIS）。^① 无论是贫穷或富裕，这个计划确保给每一个人固定数目的现金转移支付。在寻找转移目标中没有明确的努力。该计划的行政成本很可能会低，但由于需要一定形式的人员登记系统以避免“重复取款”问题，并确保规模较大的家庭能够有更大比例的收入，因此成本也不可能为零。

近期，基本收入计划的可行性会受到质疑，虽然当前已经铺开的国家身份证系统可能会对此有所改变。由于基本收入计划可能会需要新的公共交付机制，且因为近期的可行性，另外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反事实分析就是利用现存的目标工具，虽然这一工具跟预算中立转移支付机制一样并不完美。印度也拥有一个基于“低于贫困线”卡片制度的救济食物分配系统，“低于贫困线”卡片制度由印度各邦政府设立，并且通过广泛的本地化网点传递食物。很多人都认为“低于贫困线”卡片制度并不能十分精确地针对贫困人口。^② 在本文中，我们在调查数据中，将现有的卡片分配作为已经给出的，并借助其构建一个选择性的反事实工具，以便对劳动福利制度的性价比进行评价，也就是对同样的预算进行分配，但是将其作为现金转移支付，或者分配给那些持有“低于贫困线”卡片的人。

下一部分讨论本文研究的项目，第二部分将对我们的数据和估算方法进行描述。第三部分将对我们获得的劳动福利制度参与者的工资调查数据进行考察。第四部分将转向我们对放弃的收入地发现。将这些因素组合起来，第五部分我们会提供一个与上文描述过的两项预算中立计划有关的，对贫困影响的估算。第六部分，作出结论。

① 它的称呼很多，包括“集中转移”、“保障性收入”、“公民收入”以及“未变的社会红利”。基本收入计划由米德（Meade, 1972），阿特金森和苏特兰德（Atkinson and Sutherland, 1989），拉维里昂和达特（Ravallion and Datt, 1995），拉文托斯（Raventos, 2007），巴丹（Bardhan, 2011），以及达瓦拉等人（Davalá et al., 2015）提出。

② 比如，贝思利等人（Besley et al., 2012）发现，作为一个地方的政治家，在对富裕指数——包括没有土地指标——进行控制之后，某些人很有可能将拥有“低于贫困线”卡片。在撰写本文时，使用“低于贫困线”卡片进行食物分配在印度十分流行。2013年《全国食品安全法案》设想了一个更高的覆盖层次，覆盖目标的选择则留给州政府决定。

一 项目

长期以来,印度都有关于劳动福利制度计划的历史。其中的核心理念体现在英属印度 1880 年前后设立的《饥荒法案》,直至今日,这样的制度设计都在南亚次大陆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劳动福利制度计划中一项重要的要素就是确保任何希望就业的人都能够就业,并能获得预定的(通常较低的)工资水平。在南亚,此类“就业保证计划”十分流行。其中,最为突出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是 1973 年在印度开始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就业保证计划”,它长久以来也被视为一个典范(Dreze, 1990; Ravallion, 1991)。2005 年,印度中央政府实施了一个中央级版本,目前被称为“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证计划”。这一计划确保了每个愿意从事非技术性手工劳作的农户能在一年内获得大约 100 天的工作时间,并获得本项目所规定的最低法定收入。该工作的要求(或多或少是直接地)被视为一项确保的手段,以保证该项目能够使印度的穷人受益。现有的证据表明,该计划很明确地针对了贫穷的农村家庭;参见阿里卡—拉格朗日和拉维里昂关于整个印度的论述(2015),以及德塔等人关于比哈尔的论述(Dutta et al., 2014)。

“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目标是减轻农村的贫困,其承诺也是伟大的。的确,这一计划的推崇者宣称,该计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印度农村的贫困。比如,德瑞泽(2014)就称“该计划可以使印度农村最贫穷的家庭跨越贫困线”。这虽然看起来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印度国内一项雄心勃勃,并且出发点良好的扶贫计划,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它给出了宏大的承诺。该计划的规模令人印象十分深刻;根据行政管理方面的数据,大约有 5000 万户家庭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参与了该计划。^① 该计划是全国性的。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比哈尔邦,我们将比哈尔邦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称为“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

^① 参见印度政府网站关于 MGNREGS 的信息 (<http://nrega.nic.in>)。

该计划最开始且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根据农村地区需求提供额外的工作，从而减轻贫困，并且该计划直接面向穷人。直觉上，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低收入的手工工作，通常在烈日下劳作，对于那些不是真正的穷人而言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事实上，正如之前所说过的，该计划能够使贫穷的人受益。在与私人雇佣者进行工资谈判时，通过提供最低保障工资的职位，该计划可以对那些本计划之外的临时劳工的工资率施加上行压力。当出现整体经济冲击或特异性冲击时，一个运行良好能够保证就业的计划也能够提供至关重要的保障措施和安全的救济金。对于参与者而言，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额外的收益：他们可能会获得一些技能，通过为政府而非当地的地主工作获得一些公用设施服务，其中一些人还可能因此受益，政府还能保护他们工作的权利。

然而，我们从文献中已经获悉，并且从观察中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这一计划的诸多潜在影响可能并不能如愿：

- 对于计划中的工作需求，供应侧的反应可能会比较缓慢，留下诸多未被满足的需求（定量配给）。

- 工人可能达不到获取最低工资的生产力标准。

- 支付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无意的或有意的）。

- 腐败可能会存在，当地的领导或官员可能会从中盘剥。^①

- 可能会存在剥削，这来自村庄领导的买方垄断力量，特别是充当订约人时。

- 可能会存在被放弃的收入，也就是指，工人在之前经济活动中，例如临时工市场中的类似工作的机会成本。

确定贫困人群从该项计划中获得收益的关键因素是定量分配的程度；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的工人是否在需要时就能从计划中获得工作呢？德塔等人（Dutta et al. , 2012）对全印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关于“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存在着大量未被满足的工作需求。这一发现是

① 比如，当地官员可能会针对服务收取“费用”，例如提前支付工资，或者代替“影子工人”收取工资。

基于 2009 ~ 2010 年的“全国抽样调查”。德塔等人 (2014) 借助本文中使用的调查工具 (特意为本研究设计的), 还发现了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大量定向分配的证据。在那些计划中有工作需求的人里, 仅有 1/3 的人获得了工作。工作定向分配的程度对本计划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的工资率高于同类工作的市场工资率, 因此一个获得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的可靠机会能够帮助非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工人 (和雇佣者) 商讨更高的工资。然而, 此类对私人工资—劳动力市场的溢出效应不大可能会出现, 其原因是人们获得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的程度有限。根据德塔等人 (2014) 发现的平均定向分配率, 对于一个考虑到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的临时工人来说, 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收入预期值可能会远低于一般的市场工资率, 这也是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常识。因此, 在当地工资议价的过程中, 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就不会是一项可靠的外部选择。定向分配也损害了该计划的保证收益,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在需要时是否能够选择该计划。德塔等人 (2014) 报告了以调查为基础的证据, 表明在这一背景下, 该计划对于冲击的反应十分迟滞。

该计划减轻贫困的第二个途径就是为穷人创造资产价值 (可以是直接的, 也可以是间接的, 如通过私人工作供应效应)。相对于参与者直接的就业收益, “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在这一方面给予的关注较少。我们到处都能听到的一个描述是, 这些资产大部分都是没有价值的, 但这显然有些夸张。威尔玛 (Verma, 2011) 报告实地考察结果并用以评估了“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下 140 项水务工程的收益。结果表明, “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一些项目确实能够带来比直接就业更为持久的积极效应。然而, 其报告样本的选择有意地青睐于那些运营良好的项目, 因此也就不能被用来反映整体的情况。报告中存在一些有趣的观察现象, 例如项目设计和维护的本地化能力不足, 以及本地工程师对该项目兴趣缺乏等情况。^①

① 参见威尔玛 (Verma, 2011)、曼恩和庞德 (Mann and Pande, 2012) 以及吉姆曼 (Zimmerman, 2013) 的评论。

在贫穷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劳动福利制度对扶贫是否具备较好的性价比

此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有趣的观察现象，那就是该计划中任何持久的资产创造通常都会有利于当地的地主以及政治家，而不是直接使贫困农户受益，这些农户通常是没有土地的。

二 数据和方法

调查数据

为了本文的研究，我们从比哈尔农村地区的 150 个乡村中收集了两轮用家庭面板结构表示的数据。第一轮数据收集的时间在 2009 年 5 ~ 7 月，第二轮数据收集的时间为 2010 年的 5 ~ 7 月。这些数据收集的时间段是农业低迷的时期，因此也就可能是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实施的高峰时段。这两轮数据收集都包含回忆之前 12 个月发生过的事情的问题。第一次调查之前一年的雨季（2008 年 7 ~ 8 月），位于戈西河流域某些区域的汇水区发生了严重的洪灾。而 2009 年雨季时，雨水就很稀少，在第二次考察期间，诸多地区还出现了旱灾。

根据 2001 年人口普查的村庄表，我们先后推行了一项由两阶段构成的抽样设计。在第一阶段，以 2008 ~ 2009 年的行政管理数据为基础，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覆盖的较高和较低的两层次中随机选择 150 个村庄。在第二阶段，在每个村庄中随机选择 20 个家庭，从所有村庄初始清单中以及少数选定的特性中选择三个层次的数据。这一分层的方法确保了样本既包含计划的参与者也包含那些可能会有参与者的家庭。我们使用了适当的样本权重以反映抽样设计。

这些调查收集了一系列家庭层面特点的信息，包括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资产所有权和消费）、就业和工资、政治参与度、社会网络以及关于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参与度的信息和相关的过程问题。

我们对包含至少一男一女两名成年成员的家庭进行了访问，访问内容包括他们在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中的参与情况、在最近的一个工作场所对于该计划的体验、关于该项目的了解和看法、农村劳动力市场以及女

性的作用等。在选取个体时,我们偏向于本计划的参与者。抽样家庭中的成年人平均人数为2.5人(中位数为2.0人),但成年人的数量范围为1~11。所以,我们并没有采访所有抽样家庭中的所有成年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家庭中也只有一位成年人。我们的目标是抽取一个能够代表总体参与者样本的个体样本。然而,事实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通常会待在家里,因此我们也很难找到那些我们希望访问的人。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也是属实的,正如相比任何一轮的调查,这种情况反应在一个小的个体面板中。其中接近69%的受访参与者都是已婚男性户主,而他们的配偶和未婚子女则分别占18%和8%。此外,在每个村庄,关键的信息人都被问到了关于村庄现实和社会基础结构,以及如何接触到政府项目的问题。

总体而言,在两轮调查中,共有3000户家庭和大约5000个人接受了访问。平衡的面板包括2728户家庭以及3749名受访个体。这两轮调查之间,未接受采访的家庭为8%,并且没有集中在任何一个特别的阶层。拒绝接受采访的人相对较少;在未接受采访的家庭里面,有大约2/3是因为调查小组访问村庄时家中无人。

2009年2月和8月,我们还在比哈尔北部和南部精心挑选的6个村庄里开展了定性研究(Gaya, Khaimur, Kishanganj, Muzaffarpur, Purnea 以及 Saharsa)。^① 这些定性研究的结论将被我们用来解读一些定量研究的结果。

评估放弃的收入

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确定两项评估放弃的收入的方法。第一种是结构性的方法,遵循经济学中对观测的结果进行建模的长期方法,假定人们对其参与这样一个项目的收益保持消息灵通以及理性的(信息客观的)预期。人们接着可以对其参与的抉择以及劳动力供应的决策进行建模,并且(在某些条件下)重新得到他们得到的利益的估计量。第二种方法几乎未

① 定性的结果报告发布在《发展选项》(2009)、《印度格拉曼服务》(2009),另外参见 Sunai (2009) 的论述。德塔等人 (Dutta et al., 2013) 提供了研究结果及其影响的总结。

对行为作出假设，并且使用了标准的“简化模式”冲击评估方法。这需要对于那些参与者的均值和挑选的未参与者组（均值）做对比。遵循一种或两种方法，在持久的可识别的假设下，多种方法被用来评估冲击，其中包含时间分配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匹配估计量。放弃的收入均值估计量从占劳动福利制度收入的 25%（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到 50%（阿根廷）不等。^①

然而，通过这两种方法，关于放弃的机会潜在的大量经济相关的个体特质信息会被忽视。并且这一信息被那些决定是否参加的人清楚地知晓。这就引出了赫克曼（Heckman）等人所谓的“根本异质性”（也被称为“相关随机系数”），他们证明从标准计量经济学的估计量（包含那些使用随机分配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量）中得到的关于甚至是总体平均影响的推断是错误的。长期以来，这样的异质性在估算文献中都是一个关注点。^②这一问题源于估算者缺乏关于放弃的机会的信息。

还有第三条路径估算放弃的收入，也就是我们在本文中使用的。^③这是一种通过向个体参与者提出反事实问题的，处理异质性问题的非参数方法。我们援引结构性方法中的关键假定，也就是参与者对他们从参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持有无偏见的期望。差别在于，我们试图直接从参与者那里获得信息。随后，我们也不必用结构的或简化模式的方法对计量经济学估计量做出任何标准的假设，特别地假定回归残差项拥有零均值，这取决于处置状态或某些状态（工具变量）的关联。这一方法存在优势，我们能够估算平均冲击，包括对于贫困的衡量标准，并且能够从非参数角度假定调查回答中只存在传统的测量误差。我们对于利益的个体估算假定参与者对从项目中获得的收益持有无偏见的期望。虽然这是结构性方法的一个存在

① 分别来源于达特和拉维里昂（Datt and Ravallion, 1994）以及拉兰和拉维里昂（Jalan and Ravallion, 2003）。拉维里昂等人（Ravallion et al., 2005）（使用不同的方法）确认了阿根廷的结果。

② 早期的讨论包含赫克曼和罗布（Heckman and Robb, 1985）以及布约克兰德（Bjorklund, 1987）。

③ 我们并不知道之前有人使用过这种方法。Jha 等人（2012）同样问过在“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证计划”工作的受访者他们是否认为存在任何其他的工作。然而，他们并没有询问关于放弃的收入的问题，而是运用了现行的工资率进行估值。

已久的假定，但它依然受到质疑，可能会出现测量误差。在评估贫穷冲击时，我们通过获取收入的条件均值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从替代性工作的数据中给出观测结果，以提高通过我们的方法得到的平均放弃收入的有效性信心。

从根本上说，每一个被取样的个体都被问及，如果他们沒有获得劳动福利制度的工作机会，他们对于就业和收入的期望。如果受访者回答他们会在没有这一项目的情况下工作，那么我们会问他们关于工作天数和工资的问题。在试验阶段，我们会对具体问题（根据当地方言）进行适当的调整。我们也会问他们关于实际收入的问题。因此我们基本上向个体询问了收入问题。我们的方法拥有一定的优势，那就是我们获得了关于个体的冲击信息，将现存机会的特有的信息包含在内——那种在考察研究中不大可能存在的信息。因此，我们就能开展很好的分布分析法，而这是对贫穷冲击进行评估所必需的。

事实上，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参与者在村庄内所拥有的获得收入的唯一选择就是为当地的地主或一些非农业活动开展临时性的手工劳作。比哈尔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没有土地，并且在村庄世代居住。可以假定在整个农业年中，他们对于自己的劳动收入选择有清晰的认识。

我们发现，通过精心设计，受访者回答问题的比率比较高；相对于更为普通的“目标性”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很难。对访问者进行适当的培训，在我们调查的第一阶段，关于放弃的收入问题的总体回应率能达到92%，在第二轮调查中，总体回应率可达到98%。

当然，这里会存在一些异常值，或许反应出对于调查问题的误解。然而（我们将继续展现），在报告中放弃的收入的平均值与未参与项目的同类工人的平均工资率十分接近时，这样的答案就是有意义的。我们还对自己过高估计放弃的收入的可能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即使大幅高估放弃的收入，我们的主要结果对此仍是稳健的。

正如在序言中指出的一样，由于双重计算，在我们对放弃的收入的加总估算中，存在着潜在的上升偏差；两个不同的调查受访者可能会想到同